

論晚清小說裡的鐘錶暨其時間再現^{*}

張 日 郡^{**}

摘 要

本文首先考察鐘錶於中國古代小說中的相關描述，以器物、時間、素材等三方面切入，建立論述的基本架構。其次，以物質書寫的角度觀察晚清小說家如何書寫鐘錶器物，提出不同於古代小說之新的用法或現世指涉，還有如何形成新的時間感知，並結合人物心理的描寫手法，成為小說敘事之特色。接著，論述鐘點時間與小說藝術表現之關係，包含小說場景與人物行動的精細化、對於神魔想像的詮釋與轉型，及如何形塑美好之未來世界等等，呈現出新的敘事內容。最後，在鐘錶與時間再現的背後，理應有一套關於鐘錶及時間的價值探討，這些價值將與傳統思維產生裂變，折射出個人、國族及民生經濟的深刻意涵。

關鍵詞：晚清小說、鐘錶、鐘點時間、時間再現、進化論

一、前 言

「晚清」通常指的是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1840-1911）。此一時期西潮東漸、外患頻仍，導致中國政經、文化、社會等方面均產生前所未見之

2020年2月16日收稿，2021年6月7日修訂完成，2022年1月22日通過刊登。

^{*} 拙文乃科技部「『進化論』影響下的近現代小說創作（1895-1925）」（編號 MOST108-2410-H-194-099-MY3）部分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提供研究經費。承蒙三位審查人及江寶釵教授提供寶貴建議，在此致謝。

^{**} 作者係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獨立博士後研究員。

鉅變，李鴻章（1823-1901）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謂此局乃是「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¹此觀點於朝野上下開始蔓延，官僚士人紛紛以「世變」、「奇局」來形容他們所面臨的時代環境。²對於晚清之現況，朝野上下的改革、維新、立憲之聲不絕於耳，急欲奮力追趕其他歐美日等強國，追回已經「落後的時間」。³梁啟超（1873-1929）在〈過渡時代論〉（1901）中便認為：「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⁴以如此階段性、線性的時間觀，重新錨定中國的「時間」位置。無論中國文明是三千年或五千年，晚清又是否真是過渡時代，均呈現晚清知識分子不同的時間觀。

回顧歷史，新的計時工具自鳴鐘傳入中國之因，乃是明末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為了傳教，而將自鳴鐘帶入了中國宮廷，並引起明神宗的好奇與喜愛，成功達成了「鐘錶外交」。⁵入清後，自鳴鐘雖已在官方曆法上發揮作用，然而鐘錶大致仍作為一種藝術欣賞及娛樂性質，流傳在皇室宮廷與士大夫階級。⁶清同光之際，因五口通商之便，大城市使用國外鐘錶的情況越加普及，時間的測度變得更為精準，亦可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指標。⁷

1 清·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0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9〈籌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書〉，頁 44-45。

2 王爾敏，〈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變之自覺〉，《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 381-439。

3 王德威敏銳指出，他懷疑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中的新中國，只是 1902 年歐洲列強的翻版，若真如此「困於西方意識形態／政治的強權，中國所能做的，似乎總是要趕上時間前進的列車。」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45。

4 清·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464。

5 金國平、吳志良，〈從自鳴鐘探討利瑪竇居留北京的內幕〉，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 6 輯（合肥：黃山書社，2004），頁 126-132。

6 清·吳劍豐，〈候選道吳劍豐條陳改良財政言路吏治學務陸海軍警察等六事呈〉，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78。

7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頁 25-33。

具體而言，在公領域的部分，西式鐘樓多半附屬著重要的建築物，如官署、學校、教堂或醫院等設施，具有按時報響之功能，或稱之為大自鳴鐘；在私領域的部分，家用式的掛鐘、座鐘、擺鐘等，或隨身攜帶的手錶、時辰錶、兩針錶、三針錶等，均使人們除傳統的辰牌或鐘鼓之外，隨時能通曉時間；以上均會改變了人們看時間的習慣，衝擊中國傳統的時間體系，⁸使人們具有更加精細且準確的時間觀。⁹此外，不能忽略的是思想上的變革，尤其是西方「進化論」思想的傳入，¹⁰帶來了新的時間觀，衝擊晚清的知識階層，並與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循環時間觀」¹¹及中國歷史思維中的「崇古歷史觀」¹²等等，彼此共存、平行或交錯於晚清中國之中。

近現代時間觀之轉折研究，乃一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領域，涉及了多元面向與梳理脈絡，目前學界已累積不少豐碩成果。論者或從科技史或物質文化的脈絡切入，探討鐘錶器物機械工程進入中國的發展脈絡，以至於如何衝擊中國傳統的時間觀；¹³或以中國古代文獻經典之中，擷取出時間相關的材料，進行跨學科的研究，析理古人之時空觀念與思維模式；¹⁴或橫

8 關於中國傳統時間的研究，包含了呂理政，《天、人、社會：試論中國傳統的宇宙認知模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0）。徐莉莉，《中國紀時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

9 黃金麟指出時間觀念「到 1860 年代以後才有明顯的改變。」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 148。

10 關於「進化論」傳入中國的路徑及脈絡，論者已眾，累積大量研究成果。如王中江，《進化主義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美）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著，鍾永強，《中國與達爾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

11 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 36-57。

12 所謂的「崇古歷史觀」指的是朱子對於中國歷史提出的一套系統化解釋，詳細可見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189-211。

13 （英）李約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時鐘機構：埋沒六世紀〉，收入氏著，陳立夫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九冊機械工程學（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229-388。

14 劉文英，《中國古代時空觀念的產生和發展》（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

跨中外古今，結合科技史與哲學脈絡，判別出測度時間與時間之流對於中國的影響；或從歷史學，社會文化史的角度，探討時間制度的演變，尤其是鐘點時間如何影響帝國皇族、知識階層與庶民，繼而規範了帝國的國體與身體；¹⁵ 或從詩、賦的角度研究，針對自鳴鐘這樣的西方計時新物，中國文人如何運用傳統的書寫模式予以詠物，產生殊異的、陌生化的閱讀趣味。¹⁶

綜觀前述這些研究成果，小說此一梁啟超所謂「文學之最上乘」¹⁷ 的文類材料常被忽略，縱使觸及時間的討論，亦多依附於其他論述主軸，如現代性、¹⁸ 空間想像、¹⁹ 進化論²⁰ 等等。本文以「論晚清小說裡的鐘錶暨其時間再現」為題，主要還有幾個原因：（一）鐘錶這樣的計時器物如何被小說家描述，以及在小說中出現時，因應什麼樣的敘事目的、達成什麼樣的效果。（二）鐘錶的出現，新式的時間觀也會隨之再現，如此一來，小說敘事又呈現什麼樣新的效果？²¹ 本論題必然旁及了其他學科如天文、科學、史學、地理，哲學等跨科知識，但本文聚焦於小說材料中對於時間的相關刻畫與描寫，試圖陳述在中國傳統文化及西方思潮或物質文化的影響

15 楊聯陞，〈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國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 43-71。

16 游勝輝，〈人巧合天工，新物勝舊物——論清代〈自鳴鐘賦〉西方新物之書寫模式〉，《東華漢學》28(2018.12): 145-180。

17 陳俊啟，〈晚清小說與「社會動力」：梁啟超小說觀的再詮釋與重估〉，《依違於傳統現代、中西：晚清小說新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9），頁 43-88。

18 例如李歐梵在研究 1930 年代上海的「月份牌」時提到：「我認為時間——以及日曆系統——正是現代性所賴以構建的基礎。這也是安德森書中的潛在命題，即民族主義只有在時間觀念根本變更後才能被想像。」見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95。

19 顏健富，〈「仙人島」轉調：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71-207。

20 張日郡，〈「社會達爾文主義」風潮下的新小說創作——以陸士諤為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35.1(2021.6): 85-102。

21 李歐梵曾指出：「時間的觀念是不是影響了晚清小說的敘事結構？」李氏此點疑惑亦是啟發本文撰寫的動機，本文試圖先行釐清晚清小說如何描述「鐘錶」暨其時間再現，未來階段性的論析敘事結構的問題。引文見李歐梵，〈晚清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課題〉，《清華中文學報》8(2012.12): 3-38。

之下，小說敘事如何反芻過去、書寫現在及展望未來，最後凝聚研究成果。²²

本文的論述結構，首先考察鐘錶於中國古代筆記小說或白話小說中的相關描述，以器物、時間、素材等三方面切入，建立論述的基本架構。再者，以物質書寫的角度觀察晚清小說家如何書寫鐘錶器物，提出不同於古代小說之新的用法或現世指涉，從而如何形成新的時間感知，並且結合人物心理的描寫手法，成為小說敘事之特色。接著，論述鐘點時間與小說藝術表現的關係，包含小說場景與人物行動的精細化、對於神魔想像的詮釋與轉型，如何形塑美好之未來世界等等，呈現出新的敘事內容。最後，在鐘錶與時間再現的背後，理應有一套關於鐘錶及時間的價值探討，這些價值將與傳統思維產生裂變，折射出個人、國族及民生經濟的深刻意涵。

二、中國古代小說裡的鐘錶暨其時間再現

鐘錶自能從「物質文化」的面向切入研究，誠如鄧得（Tim Dant）所言：「所謂物質是可見、可觸及而且可以聞得到的非人或動物的東西。而文化是一系列圍繞著物質的人類日常活動——包括使用、分享、談論物質、為物取名，以及製造物品的方法。」²³ 本文更在意的是鐘錶何時在小說中被談論、運用？故以「鐘」（鍾）或「表」（錶）等為關鍵字，初步檢索中國「古代小說」²⁴ 中的著名且深具影響力之代表作品，例如四大奇書或三言二拍等，尚未見及。而幾部名著所出現之鐘（鍾）者，多指姓氏，或指酒器（鍾），或與鐘鼓等樂器、鐘樓等建築詞彙連用，至於表（錶）者，用法上並未有代表鐘錶者。

22 關於晚清小說觀念與敘事的轉變，學界已成果豐碩，如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演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23 （英）鄧得（Tim Dant）著，龔永慧譯，《物質文化》（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9），頁 19。

24 「古代小說」之義界，即西元 1840 年以前之小說作品。

目前所掌握的文獻，清一代較早在作品中談論國外番人傳入之自鳴鐘，當為王士禛（1634-1711）筆記小說《池北偶談》（1701），他以「談異」角度，描寫：

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為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槃，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²⁵

王士禛仍以本位主義，來看待西洋番人製作工巧精細之物。王士禛談「異」故非日常，意味著在當時自鳴鐘仍屬稀罕，因不明製作之原理便只能描述外觀與作用，而此毫無生命之物，竟能自行作用，按時發響，在當時人看來頗為奇異。至於呂熊（約 1642-1723）的白話小說《女仙外史》（1704），小說中亦有提及「小西洋國貢的是自鳴鐘二口」。²⁶

再以南袁北紀的兩本文言筆記小說為例。袁枚（1716-1797）《子不語》（1788）唯一寫到自鳴鐘的篇章是〈銅人演西廂〉，談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西方進貢了一只「銅人箱」，裡頭共有十八人，竟能自動演出《西廂記》，這些銅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銅鑄成；其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接，如自鳴鐘法。」²⁷ 袁枚此說足見自鳴鐘法，已運用至其他精巧之物。紀昀（1724-1805）《閱微草堂筆記》（1789-1798）則寫一進士王德安借宿友人家，友人以有鬼而拒之，然王德安認為世上無鬼，還跟友人說了一個故事。即江南有一岑生，亦曾借宿在滄州張蝶莊家，牆上掛有一張鍾馗畫像，畫像前放置了自鳴鐘。但因岑生醉酒，並不曉得房內有畫像及自鳴鐘，「夜半酒醒，月明如畫，聞機輪格格，已詫甚，忽見畫像，以為奇鬼，取案上端硯仰擊之。」²⁸ 以此例說明，只是人膽怯，並無鬼。自鳴鐘所發出的機械之聲，先使人詫異，訴諸於聽覺，再配合鬼王像，訴

25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下）》（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517。

26 清·呂熊，《女仙外史》（鈞璜軒刊本），頁 1321。

27 清·袁枚，《子不語》，收入蕭林主編，《中國禁毀小說 110 部》第 4 冊（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頁 236。

28 清·紀昀，《繪圖閱微草堂筆記》（臺北：廣文書局，1991），頁 55-56。

諸於視覺，藉此感官之描寫而達到鬼影幢幢之撞鬼氣氛，頗為生動有趣。滄州張蝶莊家為何有自鳴鐘，並非重點或敘事主軸，紀昀突發奇想，以此為鬼故事之素材，應是小說史上第一人。

蒲松齡（1640-1715）《聊齋志異》（1680）、吳敬梓（1701-1754）《儒林外史》（1750）等書，亦未有描寫到鐘錶或運用鐘點時間之處。至於開始大量書寫鐘錶且運用鐘點時間者，當屬曹雪芹（1715-1763）《紅樓夢》（成書年代尚有爭議，初刻於西元 1791 年）。²⁹ 賈府擁有不少如鐘錶、眼鏡、水晶玻璃、洋漆傢俱、器皿及洋酒、洋藥等等時髦的舶來品。³⁰ 鐘錶，既是賈府重要的生活依據，亦是一種身分的象徵，同時它也是當時進貢之物，如馮紫英帶了四件洋貨想賣給賈政作為進貢之物，其中一件正是價值數千兩的鐘錶，「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著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³¹ 在賈府內鐘錶也成為銘刻生活的器物，如群芳開夜宴為賈寶玉慶壽，薛姨媽因時間太晚而打發人來接林黛玉：「眾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以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十分了。」³² 中國傳統計時為晝用辰刻、夜用更點，而寶玉的錶之表時記號，非現代鐘點而是傳統的「時辰表」，而且講究至「分」，³³ 另外亦可知現代鐘點時間尚未取代中國傳統的辰刻制。

再者，「劉姥姥進大觀園」，她的所見所聞，亦是區分階級、貧富、見識的重要段落。如第六回亦有自鳴鐘：

劉姥姥只聽見咯當咯當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籬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

29 胡衍南，〈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以《蟹樓志》、《清風閣》、《雅觀樓》、《痴人福》、《玉蟾記》為主〉，《國文學報》47(2010.6): 267。

30 寧國府被抄家時，曾搜出鐘錶十八件。清·曹雪芹、高鹗著，《紅樓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 1426。

31 同上註，頁 1280。

32 同上註，頁 872。

33 吳國盛：「最初的鐘錶只有一根時針，1550 年左右增加了分針，1760 年左右出現了秒針。」見吳國盛，《時間的觀念》，頁 113。而在康熙九年（1670），官方正式明文規定「凡侯時皆準以晝夜，周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分六十秒。」見王雲五主編，《清會典》第 9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937。

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著一個匣子，底下又墜著一個秤砣般一物，卻不住的亂幌。劉姥姥心中想著：「這是什麼愛物兒？有啥用呢？」正呆時，只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著又是一連八九下。³⁴

劉姥姥以已知來解未知，描寫其按時報響之鐘聲如「打羅櫃篩麵的一般」，卻也不曉得「秤砣般一物」便是鐘擺。也不細數一連八九下如「金鐘銅磬一般」的報時，究竟是上午九點，還是十點？「劉姥姥」代表的應是中國傳統社會、庶民階層，初次接觸鐘錶新物的反應。

若再對比劉姥姥、鳳姐兒兩者身分、階級所各自代表的鐘點時間觀念，足以分判當時生活的精細與意義。鳳姐兒吩咐、叮囑眾僕的其中一段：

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³⁵

該段顯示：其一、鳳姐兒運用鐘錶，已不僅是賞玩性質，更為實際用來管理大小庶務。其二、時辰表並非以阿拉伯或羅馬數字標誌，而是中國傳統的時辰，而且屬於二針式的。其三、賈府裡的規矩、眾僕的時間，是被具體規範在鐘點時間內，而且是由賈府所掌握、主導的時間。卯正二刻是上午六點半、巳正是十點、午初刻是十一點、戌初則是晚上七點。當黃金麟點出西元 1880 年左右，「產業工人的日常生活已經被鐘點時間所強力支配」，³⁶或許可補充的是，再早一百年前，像小說賈府這樣上層階級，其僕役已受鐘點時間所支配。

此外，受《紅樓夢》影響的幾部「續書」，³⁷或是在嘉慶年間（1804）

34 清·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頁 97。

35 同上註，頁 181-182。

36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頁 148-149。

37 胡衍南，〈論《紅樓夢》早期續書的承衍與改造〉，《國文學報》51(2012.6): 179-202。

成書的《蜃樓志》亦有鐘錶或小說人物以此來約定時辰的相關段落，³⁸如《補紅樓夢》（1820）中有「寶釵叫拿過表來，看了一眼，針已指到子正二刻十四分了，因道：『天不早了，咱們睡罷，明兒還要起早呢。』」³⁹上述所列作品大致不脫《紅樓夢》的描述方式。

總結以上，鐘錶或鐘點時間於中國古代筆記小說或白話小說中的描寫，相較於晚清小說仍屬罕見，較早於 1701 年王士禎《池北偶談》已有談論，1704 年呂熊《女仙外史》亦有相關記載，而到了《紅樓夢》有更加細緻的運用，甚至影響其相關續書。據此，大致可歸結兩個部分：其一、鐘錶仍屬珍貴「異」物，並不常見於日常生活，同時也可作為一種身分、地位的象徵。其二、鐘錶所呈現的鐘點時間，已可銘刻、規範小說中的人物行動。以下幾節將進一步考察晚清小說的部分。

三、「鐘錶」的物質書寫與轉變

（一）從「異物」到「常物」

晚清之後，大城市使用鐘錶的情況愈加普及，原本王士禎視鐘錶為「異物」的情況已不復存在。晚清小說家對於鐘錶器物或鐘點時間的運用，相較於以往的作品，更加普遍且多元，成為小說敘事之「常物」。既然如此，哪些類型的晚清小說容易出現鐘錶物質描寫，又與小說家的背景有何關係，即是本小節試圖一探的問題，但礙於篇幅，僅以晚清小說界鉅子吳趼人為例，扼要一觀。

筆者以「鐘」（鍾）或「表」（錶）檢索吳趼人（1866-1910）的小說，發現《雲南野乘》（1907-1908）、《痛史》（1903-1905）、《兩晉演義》（1906-1907）及《白話西廂記》（1912）等書，其時代背景均為古代，故未出現鐘錶或鐘點時間。反之，若時代背景設定為晚清以降，無論是譴責、社會、政治、理想、言情、商業等小說，其鐘錶的物質書寫成為常態，除了有身分、場所及地域的不同之外，更有其轉變之處。

38 清·庚嶺勞人，《蜃樓志》（臺北：雙迪國際出版社，1996），頁 50。

39 清·鄭燦山樵，《補紅樓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頁 90。

先就身分而言,《紅樓夢》裡原屬於身分高貴或進貢之物的鐘錶,到了吳趸人筆下,從衙門的官員再到士子、商人,乃至於算卦的半仙均有此物,階層均已擴大,如《九命奇冤》裡喜來送撫臺衙門師爺的賄賂禮品中就有「西洋大自鳴鐘」、⁴⁰《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1903)裡吳繼之則有一只做工稀罕的「龍珠錶」、⁴¹《糊塗世界》裡琉璃廠的算卦先生張心齋居所計時用的「座鐘」;⁴²鐘錶有時為「珍物」、「禮物」、「計時之物」,有時也是「抵押之物」,如《劫餘灰》(1907-1908)裡小翁在酒樓喝酒未帶錢鈔,只得以身上之錶暫做抵押。⁴³再以場所而論,茶樓、煙館、酒樓、妓院等商業娛樂或商業場所,常是小說主角約定談事、紙醉金迷、燈紅酒綠之地,也有不少鐘錶或鐘點時間的描寫,如《發財秘笈》(1907-1908)描寫慶雲約定雪娃談事的帖子上寫著「六點鐘入席,假座新新樓」、⁴⁴《新石頭記》(1908)裡的薛蟠「取出表一看,道:『兩下鐘了,咱們去逛窯子,這時候恰好看他們梳頭。』」⁴⁵再再顯示晚清城市與鐘錶器物的緊密關係,人們大多需要依賴鐘錶來調配生活作息與維繫人際關係,「鐘錶在統一現代人的行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⁴⁶這些多方面的描寫亦是《紅樓夢》較少呈現的。

吳趸人甚至留心鐘錶在地域上的差異,例如寫情小說《恨海》(1906):「白氏道:『此刻甚麼時候了?』」棣華道:『方才聽見遠遠的打四更,這鄉莊兒上的更次,不見得準,滅了燈,又看不見表,也不知是甚麼時候。』」⁴⁷《恨海》的故事背景乃是庚子事變(1899-1901)後,白氏母女二人一路

40 《新小說》第 2 年第 7 號,頁 76。收入王燕輯,《晚清小說期刊輯存》第 8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頁 82。

41 清·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晚清小說大系》第 19 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頁 110。

42 清·吳趸人,《糊塗世界》,收入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33 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 451。

43 清·吳趸人,《劫餘灰》,《晚清小說大系》第 27 冊,頁 24。

44 清·吳趸人,《發財秘笈》,《晚清小說大系》第 37 冊,頁 46。

45 清·吳趸人,《新石頭記》,收入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33 冊,頁 182。

46 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25。

47 清·吳趸人,《恨海》,《晚清小說大系》第 29 冊,頁 33。

自北而南出京逃難的歷程。棣華是商人之女且身上有錶，但一般鄉村仍以「打更」為主，完全不同於大城市的精準鐘點時間與生活；標奇情小說的《情變》（1910）裡，小說主角寇阿男為農村兒女，沒有鐘錶可隨時觀看時間，其「鄉下人家不比上海，是通宵達旦，俾晝作夜的。……到了一更多天，早是家家熄火，戶戶關門的了。」⁴⁸ 故阿男的鄉村生活仍是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顯示晚清的鐘錶及鐘點時間有其地域之別。也可以說，從吳趸人的小說材料中，體證了中、西方的計時器物或時間體制，在晚清仍是並行不悖。值得留意之處在於吳趸人的背景，他原是廣東人，後來到了上海謀生、辦報及寫作，而上海在當時可說是全中國鐘錶最多之地，⁴⁹ 吳趸人相當有意識的將之運用到小說創作，甚至留意到鐘錶在時代、身分、場所及地域的差異，可謂具體現出鐘錶對晚清小說家的影響，而且絕非孤例。⁵⁰

本小節在鐘錶成為「常物」的物質書寫脈絡上，將之分為「珍物」、「禮物」、「計時之物」及「抵押之物」，雖然與《紅樓夢》裡的鐘錶有其共通點，不過筆者認為還有兩個面向，應可視為晚清小說的轉變之處，請見下節。

（二）從「珍物」到「贓物」與「戀物」

鐘錶既是「珍物」亦可做為「抵押之物」，也就是說，鐘錶是有價值之物，既然如此便可能引起宵小的覬覦。除了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外，無獨有偶，同樣在上海謀生的李伯元（1867-1906）一連兩部作品《文明小史》（1903-1905）、《官場現形記》（1903-1905）均描寫了鐘錶失竊的情節，恰巧三本均為譴責小說，這傳達出什麼樣的意義？

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小說主角「九死一生」的摯友「吳繼之」，有天失了一個「龍珠錶」，此錶只有核桃般大小，不知產地，初入中國價格不高，但吳繼之為它配上一條做工精細的雲南黑銅錶墜，錶墜

48 清·吳趸人，《情變》，《晚清小說大系》第27冊，頁44。

49 湛曉白指出：「上海是全中國時鐘最多的地方，早在19世紀70年代，這裡的洋行、商店、煙館、妓院、酒樓等娛樂場所，就都不甘人後地有了座鐘或掛鐘。」見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頁123。

50 陸士諤《新三國》便沒有鐘錶及鐘點時間的描寫，但《新上海》則有。

上還有杏仁般大的彌勒佛像，相當稀罕。恰因稀罕，故宵小銷贓時便容易露餡，使吳繼之發現竟是自己身邊的人「畢鏡江」所偷。畢鏡江原是龜子，其妹「小喬」則為娼妓，小喬因姿容而被督署的文案委員「汪子存」納為小妾，畢鏡江也跟著做了妾舅。

汪子存卻未留畢鏡江在自己身邊做事，反而是薦給自己的朋友吳繼之。後來，因汪子存升官，畢鏡江為了能一同赴任，於是偷了「龍珠錶」巴結小喬。吳繼之得知後卻不願追究，反而說道：「這到底是名節攸關的。雖然這種人沒有什麼名節，然而追究出來，究竟與子存臉上有礙。我那東西又不是很值錢的；就是那塊黑銅錶墜，也是人家送我的。追究他做什麼呢。」⁵¹

吳趼人以鐘錶為敘事素材，並非為了彰顯吳繼之的寬容大量，也非為了批判龜子出身的畢鏡江沒有名節觀念，或強調識貨／不識貨、時髦／落伍的階級對比，反倒是鐘錶從「珍物」到「贓物」的「不道德」流轉過程，隱含了上海洋場、官場的虛浮生態，也諷刺了趨炎附勢的世態人情，正如吳趼人的序言：「那些本是手頭空乏的，雖是空著心兒，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樣，去逐隊嬉游，好像除了徵逐之外，別無正事似的。」⁵²對吳趼人來說，原先民風純樸的上海，如今已變成輕浮險詐之地，人們將時間花在了空心的物事上頭，充滿了諷刺之味。

相較於吳繼之的雍容大度，李伯元《文明小史》裡留學生「勞航芥」便顯得裝腔作勢、目中無人。勞航芥有一只價值七百塊洋錢的「美國錶」，卻在赴任安徽巡撫黃中丞的顧問官一職時，在安徽一間簡陋的客店裡「失竊」了。一早，勞航芥為此大發雷霆：「我常聽見人家說，中國內地多賊，怎麼才住得一晚，就丟了個表？……你們這裡竟是賊窩！我才住得一夜，一個表已丟了。」⁵³勞航芥不明就裡直接動手教訓店主人，接著要將店主人直接法辦，而店主人啞巴吃黃連，僅能連忙致歉、苦苦哀求，最後東拼西湊才湊齊二百塊錢，賠款了事。傍晚，勞航芥在客店自己的房間床底下，發現這

51 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晚清小說大系》第 19 冊，頁 115。

52 同上註，頁 1。

53 清·李伯元，《文明小史》，《晚清小說大系》第 36 冊，頁 393。

只自己遺失而非失竊的美國錶，而他選擇的是將錶藏起來，澈底掩蓋事實。

「美國錶」不僅能象徵勞航芥的身分與見識，亦是他留學美國的證明，如今卻成了見不得人的「贓物」，道德上的汙點。李伯元藉由這段美國錶「失竊」到「遺失」的情節，刻畫出一個出身湖南的留學生看待同是內地的安徽，「已」是野蠻的刻板印象，更加諷刺的是，勞航芥留學時學的是「法律」，海歸後在香港當的是「律師」，但真正遇事時採取的卻是暴力的野蠻行徑，打著「文明」反「文明」。關於文明與野蠻的辯證，在晚清小說裡所在多有，但以鐘錶作為一種諷刺書寫介質，這是晚清小說值得留意的新現象。

同樣是鐘錶失竊，《官場現形記》讓竊賊現形的方式，即刻畫一個對鐘錶有「戀物」性格的莊二老爺，做為他「銷贓」的對象。雖然官衙最後抓出竊賊，但知縣莊大老爺卻不繩之以法，反而私下吃案作結，原因就在於此賊也是個官，官官相護突顯官場的陋習、腐敗與荒謬。值得一觀的則是莊二老爺，他是知縣的弟弟，其金錢觀為「價錢便宜無好貨」，只要喜歡便出手闊綽，偏愛「買鐘表，金表、銀表、坐鐘、掛鐘，一共值八千多兩銀子。你只要有表賣給他，就是舊貨攤不要的，他亦收了去。他自己又會修表，修好了永世不會壞的，所以他要這個。」⁵⁴莊二老爺展現對鐘錶的無比狂熱，稱得上是鐘錶「蒐集狂」，⁵⁵也正因他專管知縣家的帳房，經常中飽私囊，才能支撐他的戀物癖。其實，「戀物」似乎隱喻了腐敗的不只是官場，還有家庭本身。

吳趸人與李伯元運用鐘錶做為譴責世態人情的小說介質，的確是古代小說未曾見及的，這自然顯示了鐘錶逐漸的普及，同時保有珍貴的價值，方有如此物質書寫的情節。

（三）「新興物質」與「時間感知」

鐘錶做為一種新興物質，既能帶給人視覺上的衝擊，也有聽覺上的刺激，不少人將之視為時髦的象徵，此與紀昀將自鳴鐘訴諸於鬼魅之聲的形

54 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晚清小說大系》第13冊，頁212。

55 鄧得指出：「當佔有變成一種狂熱，對於該物的需求，只能以擁有該系列的物品來滿足——這就是蒐集。」（英）鄧得（Tim Dant）著，龔永慧譯，《物質文化》，頁169。

象頗不相同，這亦是「異物」到「常物」的轉變。這可從韓邦慶（1856-1894）《海上花列傳》（1892）、孫家振（1862-1937）《海上繁華夢》（1898）、張春帆（?-1935）《九尾龜》（1904）、曾樸（1872-1935）《孽海花》（1905）找到驗證。前三部作品均為狎邪小說，場景均為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對於洋貨等新興器物的描寫可謂不遺餘力。曾有論者指出，從這些新興物質之描寫，可看出這是社會轉型的特定產物，甚至可用來區別與傳統小說的不同之處。⁵⁶

《海上繁華夢》中聽書場之桌設得「擺四只玻璃盆子，裝些水果點心，還有臺上自鳴鐘、花籃、瓶花等各種擺設，裝潢得真是花團錦簇，比戲館裡年夜邊案目拉局，還要好看些兒。」⁵⁷《九尾龜》描寫了沈仲思原為娼妓洪月娥贖身，不料被其所騙，洪月娥捲款六千洋錢潛逃，自個的「房間裡也撇得亂七八糟，的不像了樣兒，連檯上擺的自鳴鐘和檯花都不見了。」⁵⁸《海上花列傳》描寫到李淑芳的妝臺擺設：「淑芳面向裡睡，沒有理會。那貓悄悄的竟由高椅跳上妝臺，將妝檯上所有洋鏡、燈臺、茶壺、自鳴鐘等物，一件一件擡起鼻子盡著去聞。」⁵⁹足見娛樂場所重視裝潢擺設，藉此塑造出奢華之場景以助生意興隆，更重要的是她們的房間都有實用的計時之物。

鐘錶，既是一種時髦擺飾，亦是生活必需品，同時還是個會發出聲響的計時之物，因而也帶來新的「時間感知」。例如《海上花列傳》描寫到李淑芳失眠時，外在環境的聲音頓時都被放大，連「檯子浪一隻自鳴鐘跌篤跌篤；我勦去聽俚，俚定歸鑽來裡耳朵管裡。……一徑到兩點半鐘，眼睛算閉一閉。」⁶⁰失眠者因其身體或心理因素，愈專注於睡眠愈加失眠，感官也不自覺的變得敏感或敏銳，抽象的時間原是無法感知的，卻因自鳴鐘規律性、強制性的發出「跌篤跌篤」的聲響；失眠者藉由「聆聽」明確得知睡眠時間正一分一秒地流逝，藉由「觀看」方能知曉失眠結束於兩點

56 樂梅健，〈論《海上花列傳》的現代性特質〉，《政大中文學報》5(2006.6): 89-104。

57 清·孫家振，《海上繁華夢》，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11 冊，頁 263。

58 清·張春帆，《九尾龜》，《晚清小說大系》第 22 冊，頁 536。

59 清·韓邦慶著，姜漢椿校注，《海上花列傳》（臺北：三民書局，1998），頁 192。

60 同上註，頁 173。

半鐘，即小說人物行動的時間描寫變得更加精細化。

又如曾樸《孽海花》有一回寫道抱病的雯青，因送給道俄公使的交界圖出了紕漏，悔恨氣結，「獨自躺在床上，思前想後，悔一回，錯刻了地圖；恨一回，誤認了匪人，反來覆去，哪裡睡得著！只聽壁上掛鐘針走的悉悉瑟瑟，下下打到心坎裡；又聽得窗外雀兒打架，喧噪得耳根出火。」⁶¹原本客觀的時間，因懊悔之情及聽覺的想像，成為可打入心坎的利器，這是失眠時間的形象化。相比曹雪芹形容之「咯當咯當」，或是「跌篤跌篤」、「閱克閱克」或「跌落跌落」，⁶²很難想像「悉悉瑟瑟」是時秒針走之聲，或可借用傅修延之論來解釋：「『觀察』可以將明確無誤的視覺形象盡收眼底，『聆察』卻需要憑經驗對不那麼實在的聲音信號做出積極的想像與推測，這一過程中必定會發生許多有意思的誤測或誤判。」⁶³聽覺的誤判（或擬人化），更形塑、墊高了主角的紊亂情緒。

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1904-1905）描寫同樣細膩，尤其寫到主角龍孟華欲尋其妻兒，內心千頭萬緒，諸多情感紊亂：

龍孟華也到榻上躺躺。聽得閱克閱克的那自鳴鐘的聲響，再是萬萬睡不著了，兩眼不住望那鐘上的長短針，像煞走到一分鐘，便是一年的樣子。眼裡望著，耳朵裡聽著，心坎上還盤算著……到那傷心的地方，那淚珠又不禁的滾出，整整的從五點鐘起到九點鐘止，肝腸也不知幾千萬轉了。⁶⁴

龍孟華內心的無奈、痛苦與等待之情，全藉由自鳴鐘的視覺、聽覺效果而具象化，他失眠時所「觀看」的長短針，螺旋迴轉的既是時間，卻也是他悲傷的歷程。而他所譬喻的「一分鐘，便是一年的樣子」，比起宋、元時期出現的「度日如年」，頓時讓他的傷心有了更精密的時間刻度。

以鐘錶及鐘點時間，結合人物心理的描寫手法，域外小說如法國小仲

61 清·曾樸，《孽海花》，《晚清小說大系》第16冊，頁219。

62 清·陸士諤，《十尾龜》，收入蕭林主編，《中國禁毀小說110部》第49冊，頁223。

63 傅修延，〈聽覺敘事初探〉，《江西社會科學》2013.2(2013.2): 223。

64 清·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晚清小說大系》第1冊，頁34。

馬（1824-1895）《茶花女》（1848）裡所在多有，而這些小說也在晚清被譯介進來。尤其林紓翻譯、王壽昌口述之《巴黎茶花女遺事》出版後，深受時人喜愛，讀者群就包含傳統士大夫、現代知識分子、一般市民大眾。⁶⁵ 檢視《巴黎茶花女遺事》如「余察亞猛每歷一分鐘，神色輒變，頤縮唇掀，若臨死刑。」或「此一點鐘中，余心緒旋起旋落，不知所措。至九點鐘聞叩門聲，余心顫甚，乃沿壁行，幸居暗隙，余呼吸之聲，都不之聽。」⁶⁶ 其內心狀態與鐘點時間的結合，在林紓與魏易共同翻譯之《迦茵小傳》亦有：「此時二女各有所思，均飄瞥如電，良不如吾書敘述之冗。蓋此思想，只算在一秒鐘中耳。」⁶⁷ 這樣的手法同樣可被借鏡，例如受《巴黎茶花女遺事》影響的徐枕亞（1889-1937）《玉梨魂》（1912）：「夢霞重疊之心事，此時亦正一往一復，盤旋回繞於腸角，無一息停，與此時鐘之搖擺聲，作心理上無形之應答。」⁶⁸ 顯然也將人物內心狀態扣合了鐘錶及其時間，成為晚清小說與翻譯小說共同的表述形式。

其實不少晚清小說家本身就是翻譯者，從翻譯小說裡自然會學習到鐘點時間的用法，甚至也會影響我們對於生命、人生的思考。莊子曾云：「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⁶⁹ 此言感嘆人生之時光短暫，並不會有人真的細究白駒之「過隙」耗費多少時間，這只是一種譬喻，一種對於人類存在的思考與感受。然而，若對照清末包天笑（1876-1973）刊登在《月月小說》的翻譯作品〈世界末日記〉（1908），將能發覺兩者在時間話語上的相異之處。〈世界末日記〉內容闡述一億萬年後，太陽及各行星即將滅絕，而眾人商討地球、眾人之生死存亡，最後以靈魂不滅之說，撫平末日之感。⁷⁰

65 相關研究請見潘少瑜，「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08）。

66 （法）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著，林琴南譯，《茶花女遺事》（上海：知新出版社，1930），頁 21、125。

67 （英）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著，林紓、魏易譯，《迦茵小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 56。

68 清·徐枕亞，《玉梨魂》（臺北：文化出版社，1992），頁 100-101。

69 清·王先謙編，《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6，頁 140。

70 李約瑟曾言：「在周而復始的時間觀念裡絕對談不到世界末日。」（英）李約瑟（Noel

小說裡地球最後僅存之天文學家，安慰尚未滅絕的人類云：「宇宙萬物，雖微塵纖芥，無一秒鐘不含其進化之點者。今吾人所處之世界，雖云滅亡，然不過進化之一現象，蛻舊易新而已。」等到該天文學家去世後：「蓋去死不過分秒間事耳。此悲慘之光陰，息息愈近，地球上之生物，轉瞬將亡，太陽每一分鐘中，必減其光，月球步步與地球相接近，最後遂與地球相合。」⁷¹ 生死在於分秒之間，似乎意味著生命可以被規範在鐘錶的刻度裡，時分秒三針，每走一步便走向死亡，呈現出時間或人生的普遍性、不可違逆性。換言之，這其實顯示鐘錶或鐘點時間強化了近代以來受其影響的小說家之時間意識。

簡而言之，如此帶有「現代性」的新的時間修辭，得到了鐘錶逐漸普及後，方能成為小說家較為具體並準確表達人物內心情境的手法之一。其次，這也隱含了中、外文學作品在世界時間上、人物行動上的連結性、同一性，時分秒逐漸成為一種跨國共通的話語，亦是一種邁向全球化的歷程。此亦與古代小說中傳統的時間描述（時辰）有所差異，下節將再詳述。

四、「鐘點時間」與小說藝術表現

（一）小說場景、人物行動的精細化

在鐘錶尚未發明及廣泛使用的古代世界，古人對於抽象的時間感知，生命經驗、身體本能或自然現象雖能起到一定作用，主要依靠還是日晷、滴漏、圭表、鐘鼓樓等傳統的計時之物，而它們仍以「時辰」為主，這也經常反映在古代小說的時間描述。如《三國演義》寫孔明南征孟獲，途遇四大毒泉，神秘老叟告訴孔明：「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以戰爭論，「時間」自然相當重要，從引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著、李彥譯，《中國古代科學》（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頁164。

71 清·包天笑，〈世界末日記〉，收入于潤琦主編，《清末民初小說書系·科學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頁87-93。相關研究可見潘少瑜，〈世紀末的憂鬱：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的翻譯旅程〉，《成大中文學報》49(2015.6): 193-232。

文中更可看出時辰的精準與否，不僅決定了大軍的生死，也關係到蜀漢的興衰，孔明隨即回：「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并吞吳、魏再興室？」⁷²顯然連「多智而近妖」的孔明，也無法「精準」得知未時已達、酉時已過，尤其還帶領大軍陷入陌生的地理環境之中，由此可看出時代的限制與小說家的寫作取向。

相對於羅貫中筆下的孔明此次南征對於時辰、地理環境的苦惱，劉鶚（1857-1909）《老殘遊記》（1903-1904）筆下的老殘因掌握了鐘點時間和地理環境的相關知識，使老殘到了一個新地方，能夠悠閒地遊歷四方。⁷³尤其是「明湖居聽書」之前，老殘「六點鐘起，先到南門內看了舜井，又出南門，到歷山腳下，看看相傳大禹昔日耕田的地方。及至回店，已有九點鐘的光景，趕忙喫了飯，走到明湖居，纔不過十點鐘時候。」⁷⁴小布政司街的高陞店、舜井、歷山、明湖居，分布於濟南府之南北向，有相當長的距離，與其說老殘的時間管理相當有效率，還不如說劉鶚的實業歷練、旅行經驗，結合他身上的鐘錶、鐘點時間，構成了此段地理遊覽之基礎，提供讀者更加精確、寫實的感受。

若再順此文本比較羅貫中描寫孔明、劉鶚描寫白妞人物出場與時間之關係，或可稍加帶出鐘點時間之小說藝術效果。眾所周知，「三顧茅廬」向來為人所津津樂道，亦是孔明出山相助劉備之典故。檢視小說情節，羅貫中將描寫重點放在人物對白設計，藉由孔明周遭之親朋好友口中，向劉備鋪墊出其世外高人的形象，同時也彰顯劉備求才若渴的決心，人物行動

72 明·羅貫中著，清·毛宗崗批，清·金聖歎鑑定，《精印三國演義》下冊（臺北：老古文化公司，2009），頁 1302。

73 劉鶚曾在 1902 年 4 月 9 日的日記裡，詳實記錄下津蘆鐵路天津到北京段，火車停靠各站之時間與地理位置，見清·劉鶚著，劉德隆整理，《劉鶚集》上冊（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頁 696。劉鶚對器物、時間、地理之間的精細考察，與他興辦鐵路與礦業的歷程不無關係，更何況興辦實業必有勞動力、鐘點時間與經濟效益的考量，這部分則與國家競爭力也會有所呼應。許暉林便指出：「劉鶚以精確的鐘點時間作為國民與國家之間關係想像的重要元素。」許暉林，〈論《老殘遊記》中的身體隱喻〉，《成大中文學報》44(2014.3): 264。

74 清·劉鶚，《老殘遊記》，頁 14。

的時間推移反倒十分模糊。以第三訪的時間軸觀之，劉備抵達草堂的時間未明，童子僅回報孔明「晝寢未醒」，而進入草堂的劉備等了「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接著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最後進入一連串的人物對白，「直接」達成振興漢室之共識，商議時間同樣未明；二人商議或孔明考慮「半霎」、「半刻」或「二個時辰」後決定出山，小說藝術效果自當不同。

相較於白妞的登場，先寫老殘首日遊完明湖之後，一路聽見白妞說書之事，進入高陞店後，又聽見茶房誇讚白妞之能，宣稱她若一點鐘開唱，沒提早於十點鐘到，便沒座位可聽。老殘次日九點鐘趕忙吃飯，十點鐘準時抵達，「園子裡面已經坐的滿滿的了。……到了十一點鐘，只見門口轎子漸漸擁擠……不到十二點鐘，前面幾張空桌俱已滿了，不斷還有人來……到了十二點半鐘，看那臺上，從後臺簾子裡面出來了一個男人……停了數分鐘時，簾子裡面出來一個姑娘……」⁷⁵藉由鐘點時間與人潮流動之結合，既呼應茶房之說又鋪墊讀者的期待之情，隨著鐘點時間的流動，具體感知小說「場景」⁷⁶的氛圍。劉鶚將人物行動從「小時」精細或聚焦到了「分鐘」，老殘似乎更加專心於黑、白二妞的絕妙唱書神技，尤其白妞表演過程：

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⁷⁷

對於熟稔鐘點時間的劉鶚而言，若將「約有兩三分鐘之久」置換成「半晌」或「頃刻」、「半霎」等中國傳統形容時間的相關話語均不合實情，而且每個人對於這三個時間量詞的主觀感受亦不相同。若置換成「時辰」、「一

75 清·劉鶚，《老殘遊記》，頁64。

76 利昂·塞米利安指出：「一個場景就是一個具體行動，就是發生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的一個具體事件；場景是在同一地點、在一個沒有間斷的時間跨度裡持續著的事件。」見（美）利昂·塞米利安（Leon Surmelian）著，宋協立譯，《現代小說美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頁7。

77 清·劉鶚，《老殘遊記》，頁17。

刻」仍嫌不夠精準，似乎得這兩三「分鐘」方能將滿園子人的期待之情通和盤托出。故，劉鶚在鋪陳黑妞、白妞的唱書過程，強調時間與空間之描寫，同時形成一種線性的時間敘事，使讀者對於小說的時間感有了共同的依據，以可度量的表層時間「分鐘」計，既不失客觀卻又呈現其「現代性」之特質。再者，呈現出寫實的效果，使該場景的人物形象更加立體了起來。

總結以上，兩位小說家之筆法其實各有側重或淵源，而劉鶚將「鐘點時間」運用在小說敘事之中，將小說場景、人物行動的時間描述更加精細化，同時也強化了讀者對文本的時間感受與人物形象的立體化。

（二）神魔想像的詮釋與轉型

神魔小說有其自成之時空觀，仙境、地獄的時間設定多半與人間不同，「天上（仙境）一日，人間一年」⁷⁸ 常見於古典小說，而小說人物突破時空限制、穿梭三界之間亦所在多有。以此延伸思考，當鐘點時間介入之後，晚清小說家如何詮釋與書寫原本的神魔想像，本小節將扼要一觀。

以地獄為例，劉鶚在《老殘遊記二編》第八回，描寫老殘夢遊陰間，觀覽地獄懲罰之景，特別是油鍋與磨子均運用鐘點時間來表述懲罰之時間歷程。如鬼卒將大漢的骨頭架子，往油鍋裡一送，「約有一二分鐘的工夫，見那人骨架子，隨著沸油上下，漸漸的顏色發白了」，接著再將骨架子挑出往鍋外一摔。類似的油鍋懲罰在《聊齋誌異·續黃梁》亦有，同樣是鬼卒將罪人丟入油鍋，「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叉取曾，復伏堂下。」⁷⁹ 從這便可看出鐘錶及鐘點時間介入之跡，《聊齋誌異》所言之一頓飯的時間實因人（神魔）而異，《老殘遊記二編》採取之鐘點時間則具備共通性，地獄的時間觀似乎也因著小說家現實經歷產生了現代性的轉型。

此外，老殘亦對磨子磨人計了時，「一分鐘磨四五個人，一刻鐘豈不要磨上百個人嗎？這麼無數的磨子，若詳細算起來，四百兆人也不夠磨幾

78 相關研究請見黃東陽，〈歲月異遷，常恐奄謝——唐五代仙境傳說中時間母題之傳承與其命題〉，《新世紀宗教研究》6.4(2008.6): 37-66。

79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長春：吉林出版社，1995），頁 256。

天的。」⁸⁰ 王德威曾指出，此地獄之景可看做是「遲來的詩學正義，借以平衡小說初集中不少的冤案。」⁸¹ 劉鶚的敘事受到鐘點時間的影響，形成新的時間感知描寫，使得原本不真實的夢或地獄之景，因其運用了現實的時間量詞「分鐘」來作為人間／地獄的公約數，加上直接連結整個中國「四百兆人」，使讀者感受到仿佛施惡／懲戒均在倒數，時間層層逼近。

再以《西遊記》為例，神通廣大的孫悟空一個筋斗便可走十萬八千里，但到了晚清小說家陳天華（1875-1905）《獅子吼》（1906）筆下，逐漸轉變為現實或可用現實來解釋，其中不僅牽涉到鐘點時間，還有現代交通器具的進化與改變：

《西遊記》說齊天大聖一個筋斗能走十萬八千里，又稱他上能入天，下能入海。……。這些話《西遊記》不過是扯一扯謊，使讀者稱奇。那知洋人現在竟實地裡做出這樣的事來了。……火車每日能走四千多里，已快的了不得。又聞德國有一種電汽車，一分鐘能走九里，一點鐘走得五百四十里，聞說還可以加倍，豈不便快嗎？美國已有了空中飛艇，一隻可坐得三十人，一點鐘極慢走得一千里，即是一日一夜走得二萬四千里，三天可把地球周回一次。海底行船更是不稀罕的事。可惜海龍王的話又是扯謊。⁸²

何以一部充滿濃厚的排滿、革命及進化思想的小說，會特別提到《西遊記》？陳天華在小說中，藉由一個愚昧守舊、思想排外的和尚，與一個思想開明、即將留學美國以救國的青年對比，使青年一席言廓清和尚的諸多迷信，因和尚相信《西遊記》描述均為真，那歷經八十一劫難，耗費十八年時光，有齊天大聖一路保護的「五印度」，絕非凡人可以企及。但青年卻告訴和尚，這一切歐美國家均可辦到，連「五印度」都能在坊間地理書中找到具體位置，僅需要搭輪船、火車等新興交通工具，不到半個月便可抵達。

80 清·劉鶚，《老殘遊記》，頁 275-276。

81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194。

82 清·陳天華，《獅子吼》，《晚清小說大系》第 7 冊，頁 50。

這不僅呈現出晚清地理學、交通學、進化論等新興科學的介入，改變了小說家的世界觀。⁸³ 同時，鐘錶與鐘點時間的興起，也和交通方式的改變有莫大的關係，學界已有成果不必贅述。⁸⁴ 筆者欲補充的是，神魔空間本就依小說家的主觀意識而定，因此具備不定性，但是到了晚清之後，此空間已可以被鐘點時間與交通工具所測量的、比擬的，也促使陳天華得以新的眼光來看待《西遊記》。

識者亦可發現，陳天華所描述的交通工具頗有誇大之嫌，⁸⁵ 其實恰可將其視為「神魔幻想」轉變成「科學幻想」之跡，更透露出依靠神仙不如依靠人力的思維。⁸⁶ 若扣緊《獅子吼》的思想脈絡，小說希望能透過學習歐美強國的文明制度、機械器物來以夷制夷、光復中國，使「睡獅」轉醒，更要在「弱肉強食」的五大洲裡，進化成世界第一等強國。那麼陳天華的描述便富含了隱喻，這些立基於晚清現有的基礎之上，透過其主觀的渲染，配合鐘點時間、動力與行進距離，以加深讀者之印象的交通器具，其實給予讀者一個「希望」——「照科學的話說，將來天地一定是沒有權的，晴雨寒暖，都可以人力做到。……恐怕不止如那個《封神》、《西遊》

83 顏健富指出：「知識分子逐漸接觸新地理觀，五大洲與地圓說已成新地理標誌，敲醒了守舊派的『天朝中國』的美夢。新地理觀影響了中國固有的地理學知識，使得晚清知識分子拓展出全新視野，將眼光投向全球。」見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頁 188。

84 可參考唐宏峰，〈日常生活、視覺經驗與文學敘事：近代文學中的新式交通工具（1870s-1910s）〉，《東華人文學報》20(2012.1): 107-136。

85 西元 1904-1909 這幾年間，晚清小說家開始密集的想像、描繪飛天的交通工具，並配合現代的鐘點時間，構築晚清的「空中戰爭未來記」，這些描述的目的在於希望中國能迅速強大起來。例如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裡可橫越五大洲，甚至只要花上「百十箇鐘頭」，便能飛抵月球的「氣球」；海上獨嘯子《女媧石》（1904-1905）發明一日二十四時，能行二千三百英里的「電馬」等等。引文請見清·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頁 198。清·海上獨嘯子，《女媧石》，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3 冊，頁 489。相關研究請見陳平原，〈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中國文化》13(1996.1): 114-131。

86 相關研究請見張日郡，「晚清以降《三國志演義》故事新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6），頁 36-90。

一派荒唐話所言的了。」⁸⁷ 那些愈走愈快的交通器具、愈來愈精細的鐘點時間都能在中國實現，彷彿是光復中國的「時間量詞」，即便這些量詞多半是誇大不實、無法驗證的，至少小說家試圖告訴讀者時間軸上即將發生的事。

（三）烏託邦、大同世界與宇宙時間

承上所述，時間軸上可能發生的事之一，即烏託邦。⁸⁸ 本小節以下聚焦於「鐘點時間」來討論兩部標註「理想小說」的文本。蕭然鬱生《烏託邦遊記（1906）》告訴讀者，光是搭乘要去烏託邦的「飛空艇」上，已能體會「維新時代」之美好，飛船每晝夜可行五萬幾千里，二禮拜可到烏託邦，船上食衣住行育樂通包，兼合格物及哲理教育，還可學習製造物件，「真是世界上極文明國的輪船也是沒有這樣完善」，其洋洋灑灑十五條章程，其中七條與「鐘點時間」相關：

（一）飛空艇定於七點鐘早膳，十二點半午膳，七點鐘晚膳，各搭客聽當中大自鳴鐘為準，如遲到膳室者，不能另行添補。（二）飛空艇搭客定於六點鐘起，十二點鐘臥，不得參差妨礙同船搭客。（三）飛空艇於第四層樓設俱樂部數間，內置世界上各種音樂及各種嗜好品，惟此室每人只二點鐘可住，又設化學試驗所一間，欲研究者可以任意試驗。（四）飛空艇每日下午一點至四點鐘，在各層樓內俱設講習會，內分格物、哲理兩大部細目極多，臨時再分傳單。（五）飛空艇內設製造廠一所，搭客欲學習製造者，約五點鐘即自能製造一種物件。⁸⁹

蕭然鬱生的暗示，最文明之處在於樹立章程、定時，遵照精準、確實與便利的鐘點時間，凡事均有時間規範與安排，而且作為乘客的「烏有生」在

87 清·陳天華，《獅子吼》，頁 51。

88 顏健富指出中國早期「對『烏托邦』的翻譯多為『烏託邦』」。相關晚清烏托邦的研究，顏著已有十分精闢的梳理與見解，請見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頁 137-169。

89 《月月小說》第 1 號，頁 96-98。收入王燕輯，《晚清小說期刊輯存》第 24 冊，頁 110-112。

這二禮拜的時間，是享受、學習及體驗，相對在飛空艇上的工人在這二禮拜的時間，則是付出、生產及服務的，彼此「準時」與「守時」成為最基本的價值。蕭然鬱生雖然來不及抵達他的烏託邦，但是，飛空艇既然在趕往的路上，那麼想必烏託邦文明、美好生活之時間觀，大概相距不遠。

高陽不才子（許指嚴，1875-1923）《電世界》（1909）設定故事時間為宣統一百零二年、西曆二千零十年，昆侖省烏託邦共和縣地方，出了一個電學大王黃震球，透過新的磁電原質「鋸」，打造了電氣世界。《電世界》曾被論者稱作「上世紀初最動人的『世界人』想像。」⁹⁰實則因電學大王所發明的交通工具，同陸士諤《新野叟曝言》中的飛艇一樣瞬息千里，如「自然電車」行駛三千五百公里，只要二十分鐘；「公共電車」，一千里之外的全球地方，無所不通，每一小時必有一輛，晝夜換班，沒有休息；「地方電車」，專供一千里以內的地方使用。「國民出門去幾千里幾萬里算得甚麼，猶如在家裡走動一般。」隨後又有學生改良地方電車，一小時最高可達八百里。藉由「鐘點時間」的描繪，《電世界》似乎不再是世界一日生活圈，而是小時生活圈，而空中亦沒有國籍、人種、疆界之別，世界猶如一家。

高陽不才子的器物描寫、地理概念及所謂的電學，均呈現了對「時間」的錙銖必較，誠如書中所言：「在下曾經說過，這時幹事的，不肯空費黃金時間，所以都坐空中電車。」建構新式交通網，連帶的也建構了新式的時間觀，而且《電世界》呈現的乃是一種「惜時觀」。因讀到結尾才發現，電王憑著一己之力所打造的「大同世界」，有效期限雖長達「二百年」，但在小說敘事時間卻是短暫的，讀者猛回頭才驚覺「大同世界」竟已消逝，故不得不去珍視此「大同時間」。

以小說發想、解決或虛構人類生活困難、促進便利的器物發明容易，但人心卻不是這麼一回事，隨著電王在宣統三百零二年宣稱對於人性中的惡念仍沒有根除之法，便決定乘著空氣電球到「他世界」去尋求人類道德心圓滿的方法，此「大同時間」似乎也隨之終結。出走他世界之因，令人聯想起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所述：「世界的進化是沒有窮盡的，時時

90 顏健富，《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頁 43。

刻刻都在過渡時代裡頭混來混去，若要在政治上、人羣上、歷史上找一件完全美滿的事情，只怕再過一千年、一萬年都找不著哩。」⁹¹ 電王只能預設立場並展望太陽系，「他世界的人類竟能圓滿，亦未可知，但是他世界在那裏呢？一行星一個世界。」似乎不再滿意人類世界所定義的「大同世界」或「大同時間」，連小說最後的總評都指出：「大同世界，聖賢欺人之語，作者並不主張此義，所以說必須如此如此，方纔是大同世界。」⁹² 文中所述之「如此如此」是什麼呢？

高陽不才子預告未來會有一部《金星世界》，可見他接下來欲虛構金星上人類道德完滿之證明，這或許才是那「如此如此」語義未明的原因，同時也意味著接下來進入了探索「宇宙時間」。無獨有偶，不只未出刊之《金星世界》，晚清還有一些描寫星際旅行之作品，雖有調動其所知之科學知識盡情幻想，但終究以帝國末年的政治、時局及民生議題作為依歸，他們所謂的未來常常是歐美現在的強化版。⁹³

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指出機械計時工具的使用，會使日常生活產生深刻的結構變化，也是社會關係中基本轉型的建構性要素，尤其是通用的計時系統與標準化的時區，均與地理、交通、通信有密切聯繫，這也成為了一種「全球化」的過程，不同於所有前現代的時代。⁹⁴ 從本文的探討中發現鐘錶與鐘點時間確實影響不少晚清小說家的時間感知模式；他們站在時間軸上，一方面回顧過往，痛心疾首，深懷亡國恐懼，另一方面又馳騁想像，乘著飛車，想再眺望、抵達更遠、更美好的所在，但常常力有未逮、力不從心。晚清小說的時間敘事亦如一鐘擺，無論擺向過去或是未來，軸心都是晚清的此時此刻。

91 清·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晚清小說大系》第31冊，頁23。

92 《小說時報》第1期，頁28-29、38、52、57。收入王燕輯，《晚清小說期刊輯存》第43冊，頁274-275、284、298、303。

93 相關研究成果請見潘少瑜，〈星際迷航：近現代文學中的宇宙視野與自我意識〉，《中國現代文學》34(2018.12): 65-84。

94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趙旭東、方文、王銘銘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18。

五、鐘錶與鐘點時間的價值探討

（一）經濟訛詐與國族自信

在鐘錶與鐘點時間再現的背後，其實也隱含了晚清小說家對於「時間價值」的關懷，有些關注到時間與經濟、國族與外族在「全球化」歷程中的轉變，有些則從鐘錶聯繫到個人作息、國族強盛的關係，有些談的是如何尋回或再創屬於中國人的輝煌時間，呈現出時間議題在晚清此一面臨國族危機與西方工、商業文明襲來的歷史語境裡之重要性與多樣貌。以下依序闡釋之。

首先，晚清在西方工業文明及商業模式的衝擊之下，本國／外國的時間觀念與經濟價值已產生變化，尤其以工、商業為主體的城市更是如此，「時間」也成為政經運作模式中，被精心安排與精密計算的對象，⁹⁵這部分在被稱為晚清唯一一部長篇「商人小說」⁹⁶的姬文《市聲》（1904）裡實可體現。姬文多面向的描寫了許多上海／鄉下、商人／工人、官吏／捐客間的差異、內幕與醜態，值得關注的便是小說裡呈現出時間與經濟、國族與外族的關係。

小說描寫一名規矩的、不懂算計的木匠自上海返鄉，看見故鄉勞工窮困潦倒，於是幫助了他，並思索他「可惜沒做外國人」：

我聽說美國的工價，那製銅廠裡每天做十個時辰工，要拿他三塊多錢；做靴子的工人，一禮拜好賺到二三十元。走遍了中國，也沒這般貴的工價，所以人家不愁窮，我們動不動沒飯吃。⁹⁷

與中國傳統社會的勞動形式不同，在交通、科學及通訊全球化的過程中，基層工人階級的視野是被打開的，故可透過不同管道得知外國的工價，並透過鐘點時間來換算、比較，卻發覺自己與外國人同工不同酬。使得這些勞動時間長卻經濟價值低的基礎工人，頓生「可惜沒做外國人」之嘆，內

95 吳國盛，《時間的觀念》，頁 124。

96 阿英編，《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99。

97 清·姬文，《市聲》，《晚清小說大系》第 37 冊，頁 10。

心或有「抱愧」、⁹⁸或有矮人一截之感，無疑是對民族自信的一大打擊。

更別提腐敗多來自於中國人自己，例如《市聲》裡身為工廠督導的總辦，謊稱工人偷懶進而訛詐工資中飽私囊，使工人群情激憤：「我們八點鐘做工起，直到晚上方歇，如何算是躲懶？你何時看見我們只做半天工？你天天住在公館裏，馬車出進，吃館子，逛窯子，也沒見你到過廠房一次，偏生會造這些謠言。」⁹⁹工人以身體勞力、鐘點時間換取工資，而商人或總辦等階層卻能以金錢、人際關係來賺取金錢，他們的「勞動時間」均在人際交往，幾千幾十萬銀兩的生意，就在公館、酒局或聲色場所一筆筆的談成，除此之外，還要訛詐自己工廠的工人，寡廉鮮恥、唯利是圖。在此，《市聲》帶出西方資本主義入侵，著實衝擊中國傳統倫理與道德之困境，傳達出晚清上海「時間就是金錢」¹⁰⁰的新型經濟型態與商界怪現況。

民族自卑與經濟訛詐結合起來，便有了這樣的小說內容：《市聲》有一段「官場捐客」聯合「外國人」詐騙「二品官員」的情節，特殊的是此情節密集出現「鐘點時間」，不僅是因為雙方談判、簽約的場景是上海酒樓而已，更呈現中外時間觀念的差異與騙術高明之處，如這段捐客安撫遲到的官員云：

仲魚著急，暗道：「不好！外國人是最講究信實的，我誤了鐘點，準會不著他，還要被他說我們中國人腐敗哩！」。……杭覺笑道：「外國人約了外國人，自然不差一分鐘。他們約了中國商人，就預備人家晚到的；況且約了中國做官的人，差這麼一兩下鐘，也是常事。他們說得好，中國人要辦事認真，沒什麼延宕，也做不來官哩。」¹⁰¹

98 清·姬文，《市聲》，頁2。

99 同上註，頁90。

100 富蘭克林曾在西元1748年〈給一個年輕商人的忠告〉提出「時間就是金錢」、「錢可生錢」等概念，這與中國傳統「一寸光陰一寸金」的思維概念不盡相同的，兩者在《市聲》一書或有可對話之處。引文請見（德）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著、馬奇炎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意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43。

101 清·姬文，《市聲》，頁199。

「守時」與「信用」在外國人眼中是同一件事，¹⁰²不過在此出現卻只是詭詐官員的話術。姬文《市聲》藉由這樣的情節彰顯了兩件事，其一、鐘點時間的運用，則令我們見識到官場捐客的勞動時間、詐騙的時間歷程，不費數十個小時，輕易詭詐了五萬元，體驗上海乃是小說裡所講「沒得算計一世窮」之地。其二、中國官員之所以被詭騙，最主要是他內心其實隱含了「外國文明，中國腐敗」的民族自卑感，方使詐騙得以最後成真，不僅成為晚清小說新的情節內容，也帶出了姬文對於晚清政經時間的價值判斷與關懷。

（二）個人作息與國族強盛

承上述，從商人小說《市聲》裡不守時的中國官員，再延伸觀察其他小說裡官員的個人作息，亦可得知中國腐敗的線索。例如李伯元的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中運用鐘點時間，記錄了蘄州知州區奉仁的鐘點生活：

我們這位堂翁也是個大癮頭，每日吃三頓煙，一頓總得吃上一個時辰。這個時辰單是抽煙，專門替他裝煙的，一共有五六個，還來不及。此刻五點鐘，不過才升帳先過癮。到六點鐘吃點心，七點鐘看公事；八點鐘吃中飯，九點鐘坐堂；碰著堂事少，十點鐘也可以完了，回到上房吃晚飯過癮。十二點半鐘，再到簽押房看公事。打過兩點，再到上房抽煙，這頓煙一直要抽到大天亮。¹⁰³

區奉仁「做官的身體」時間被精密分割，但實際是被鴉片煙癮所制約，每隔一段時間便得回去「過癮」，甚至得熬夜抽煙，導致日夜顛倒、政事不專。《官場現形記》曾刻畫童子良此一不喜洋貨的貪官欽差，乃是「天朝的大臣，應該按造國家的制度辦事。什麼火車、輪船，走的雖快，總不外乎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傷國體，所以斷斷不敢。」¹⁰⁴若「做官的身體」可以扣連「國家的身體」的話，那麼每日至少花六個小時滿足煙癮，一週

102 李伯元《官場現形記》亦有同樣的描述。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晚清小說大系》第13冊，頁79。

103 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晚清小說大系》第14冊，頁684。

104 同上註，頁701。

便是四十二小時，一年則是超過二千小時，若再加上替他裝煙「做工的身體」耗費之鐘點時間……其結果隱喻了一個國家腐敗的鐘點數字，亦可能是滅亡的時間倒數訊號。

其實，鐘錶與個人作息的關聯早於《紅樓夢》已有呈現，而能與國族強盛產生關聯之歷史背景，仍來自於晚清所面臨的危難處境。晚清小說家亦觀察到這個重要觀念，因此在小說中特別將個人作息國族強盛緊密聯繫起來。例如蔡元培（1868-1940）《新年夢》（1904）藉由主角「中國一民」的夢境，想像、建構中國美好之未來，達到不被歐美強國侵略的境地，反過來統一語文、文字與思想，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但這樣的美好如何成真？

「中國一民」認為得改造「國民性」，將自掃門前雪的「家人」，改造成關心國家大事的「國人」，最後才能成為「世界人」，實踐世界大同之理想。在這個改造過程中，先得為這些家人規劃一生的課程、一日的課程，並運用鐘點時間劃分個人作息表：

（四）每人一生的課程：七歲以前是受撫養的時候，七歲到二十四歲是受教育的時候，二十四到四十八歲是做職業的時候，四十八歲以後是休養的時候（但休養時亦可兼任教育等事）。（五）每人一日的課程：二十四時間，做工八時，飲食談話游散八時，睡散八時。¹⁰⁵

第五點強調「做工八時」對應的是第四點「做職業」的階段，而其均勻的劃分每個人的二十四小時，而且限定每個類別的時數，正是準確性、同一性與限定性的展現。¹⁰⁶即便蔡元培並未說明第四、五點的分段基準，但可看出他以一日連結到一生、以家人連結到國人，也就是將個人作息連結到國家民族，只要每一個人都能各司其職、培養愛國之心、精確管理好自己的時間，就可能實現真正的大同。《新年夢》雖沿用了中國傳統「南柯一夢」的表現手法，卻可見蔡元培嘗試運用鐘點時間（強制）規範、管理中

105 清·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34。

106 早在1898年譚嗣同等維新人士，便於湖南長沙發起「延年會」，試圖讓加入之會員，透過共同的、嚴格的個人作息時間加以規範。只要能有效掌握個人時間，便可提升生命效率，促進國家民族走向強盛。楊念群，〈論戊戌維新時代關於「習性」改造的構想及其意義〉，《浙江社會科學》5(1998.9): 105-110。

國人的身體，已非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藉此達到國族強盛的目的，這也是古代小說未曾出現的情節。

若蔡元培所強調的是「做工的身體」，那陳天華《獅子吼》則可稱作「軍事的身體」。關於《獅子吼》的旨意，上文已有梳理，不再贅述。小說裡描述一位原本欲在中國設立獨立軍的排滿反清志士，因事跡敗露而被兩湖總督所追殺，逃難到了民權村受到書中主角們的幫助。主角們對於總督殺害自己同胞來媚異種，不僅表達憤恨之情，更希望能強健體魄，為同胞報仇，故擬定了練操的章程：¹⁰⁷

- (一) 於本學堂每週(七日為一周)原有五點鐘體操之外，再加體操課五點鐘。(二) 於每禮拜三禮拜六兩日開軍事講習會，各以兩點鐘為度。(三) 於禮拜日將全堂編成軍隊，至野外演習，公舉一人指揮。(四) 每年開運動會兩次，嚴定賞罰，以示勸懲。(五) 非入病院者，每日體操和軍事講習、野外操演等，皆不准請假。¹⁰⁸

民權村原為化外之境，當排滿反清、革命意識進來之後，村人們個人的身體、時間便受到鐘點時間嚴格規範，從每日、每週到每年均分配了限定的體操與軍事時數，成為了「軍事的身體」，除了生病之外，無法請假休息，其強制性更甚於「做工的身體」。在小說中，眾多「軍事的身體」組織成「強中會」，以鐘點時間來實現救亡圖存、富強中國的最終任務，成為一種身強則國強的緊密隱喻。

蔡元培與陳天華均已意識到現代鐘點時間、個人與國家之關係，針對鐘錶所提供的準確性、同一性，甚至限定性，進而規範小說人物的個人作息，期望達到光復中國之目的。

(三) 奇技淫巧與傳統國粹

相較於上述晚清小說家著重於時間全球化後的現象描寫與譴責，吳

107 關於晚清「體操科」納入各級學科的相關制度及影響，請見周東怡，〈清末《奏定高等小說堂章程》與《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的修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0(2018.12): 79-118。

108 清·陳天華，《獅子吼》，頁 38-39。

趸人《新石頭記》的書寫則隱含了一種力抗「時間」的統一性、全球化，成為一種特殊的時間表述。若要解析小說中的時間價值，則需要從奇技淫巧與傳統國粹兩端切入。首先，小說第一次出現鐘錶的討論，乃是第九回賈寶玉批評薛蟠身上可以打出聲響的「打璜表」¹⁰⁹乃是「女人用的東西」，原因是「作為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賈寶玉接著說道：

巧而有用，便不叫淫巧；巧的無用，徒然取悅耳目的，才叫淫巧呢。比方鐘表，何嘗不巧，然而鐘擺在家裡，一家都知道時候；表帶在身上，出門、走路都知道時候，這就是巧的有用了。至於這個打璜表……他就是不打璜，也可以知道時候，何必要打呢？¹¹⁰

雖然早在清道光年間便有洋貨乃「奇技淫巧，壞我人心」¹¹¹之論，但吳趸人並未全盤否定洋貨，他在意的是實用性，只要它「巧而有用」即可，正面肯定鐘錶做為計時工具的功能。此段尚未涉及國家民族的討論，反而當賈寶玉進入了吳趸人所描繪的理想世界「文明境界」時，才真正觸及了這個議題。第二十二回，賈寶玉看見了文明村裡的「司時器」，無不驚嘆折服，村裡的嚮導老少年與賈寶玉就司時器展開了對話：

……老少年已經覺得，笑對寶玉說：「這是『司時器』，就同那歐美鐘表一般，按時報出來的。」寶玉道：「鐘表已是巧制，這個更巧不可階了。」老少年道：「鐘表雖是巧制，無奈他的記號不同。我們本是從子至亥的十二時辰為一晝夜，他卻以二十四點鐘為一晝夜。那鐘面記號又只有十二點，要記起時候來，必要分個上午、下午，豈不費事？……我們又何必捨己從人呢？」¹¹²

單就吳趸人對司時器的描寫，並無法令人理解何以它「巧不可階」，卻突顯出吳趸人之態度：「我們又何必捨己從人」。尤其從其錶面記號來

109 「打璜表」在《負曝閒談》、《官場現形記》均有描寫。

110 清·吳趸人，《新石頭記》，頁202。

111 清·管同，《因寄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04冊），初集卷2〈禁用洋貨議〉，頁7a-8。

112 清·吳趸人，《新石頭記》，頁283。

看，司時器並非使用需要翻譯、標注上下午區別的阿拉伯數字或羅馬數字，反而是沿用了中國原有的十二時辰制，也可以說是沿用《紅樓夢》裡的時制。更有意思的是，尚未進入「文明境界」前的章節，使用的是西方的鐘點時間，而非他所謂的時辰制。這不僅意味著《新石頭記》擁有兩個時間，一個是當時上海通行的「鐘點時間」，另一個則是吳趸人心目中的「理想時間」，兩者差異之一就在於「表時記號者」的不同，因為時辰制屬於中國傳統所固有，而鐘點制卻屬歐美強國所制定的，那麼這個差異的意義何在？

吳趸人對鐘錶的詮釋、定義與掌握，亦可以文明境界裡的飛車「時刻表」為例。賈寶玉問老少年：「不知可同火車一樣，也有個公司，有一定開行的時刻沒有？」老少年的回答：

這裡沒有這種野蠻辦法。人家出門是沒有一定時刻的，說聲走，就要走，他的車卻限定了時刻，人家不出門的時候他開了；或者人家忽然有事要出門，他卻不是已經去了，便是還有半天才開呢！¹¹³

吳趸人在討論隧車時，亦提到「限定時刻往來的，最是誤人事。」¹¹⁴ 看似對軌道列車非人性化的限定時間提出批判，同時也隱含了由「誰」掌握這個時間的問題，而火車、隧車或是公司在小說中多為歐美強國所有，誠如吳國盛所言：「誰控制了時間體系、時間的象徵和對時間的解釋，誰就控制了社會生活」。¹¹⁵ 吳趸人想要傳達的，仍是「我們又何必捨己從人」的態度，拿回或創造屬於中國的時間，隱含了一種力抗「時間」（尤其是歐美強國的）的統一性、全球化。

此點亦可從小說描述「飛車」段落中察覺，該「飛車」雖經科學及電氣改良，但「本來創造這車的時候，也是因為古人有了那理想，才想到這個實驗的法子。」¹¹⁶ 換言之，象徵文明、自由、人性化的飛車，其實本

113 清·吳趸人，《新石頭記》，頁 299。

114 同上註，頁 357。

115 吳國盛，《時間的觀念》，頁 120。

116 清·吳趸人，《新石頭記》，頁 302。

國（小說中提到《鏡花緣》）早有發想，此乃中國傳統所固有的，就「想法」上，中國遠勝他國，藉此恢復民族自信心。

總而言之，吳趼人建立「文明境界」，所欲討論的正是愛種愛國、保全國粹，故得從中國傳統國粹中尋找重建的力量。無怪乎，小說結尾指出讀者們要看《新石頭記》得要「熱心血誠，愛種愛國之君子，萃精會神，保全國粹之丈夫，方能走得到、看得見。」¹¹⁷縱使有論者指出，吳趼人《新石頭記》要保全的是西化了的國粹，但是吳趼人為了展示此一最理想的時間與空間，特別將司時器的表時記號回歸傳統用法，並批判非人性化的限定時刻，所欲提示晚清世人的是面對歐風東漸，不可「見異思遷，盡忘其本」¹¹⁸，尋回或再創屬於中國人的輝煌時間。

六、結 論

本文聚焦鐘錶及鐘點時間的議題，深入挖掘晚清小說裡的諸多描寫，凝聚以下幾個研究成果：

其一、以鐘錶做為物質書寫，在晚清小說中成為一種常態。小說家留意到鐘錶在時代、身分、場所及地域的差異，可謂具體現出鐘錶對晚清小說家的影響。如吳趼人與李伯元均運用鐘錶做為譴責世態人情的小說介質，的確是古代小說未曾見及的，成為新的開拓。此外，鐘錶，既為一種時髦擺飾，亦是計時之物，因而也帶來了新的「時間感知」。

其二、鐘點時間的運用，成為小說藝術表現的一環。如劉鶚將「鐘點時間」運用在小說敘事之中，將小說場景、人物行動的時間描述更加精細化，同時也強化了讀者對文本的時間感受與人物形象的立體化。同時，當「鐘點時間」介入之後，促使晚清小說家以新的眼光，詮釋並重寫原本的神魔想像，如陳天華《獅子吼》便有「神魔幻想」轉變成「科學幻想」

117 清·吳趼人，《新石頭記》，頁408。

118 清·吳趼人，《我佛山人文集》第8卷（廣東：花城，1989），頁84-85。相關研究可見陳文新、王同舟，《新石頭記》的文化藍圖與清末民初的文化轉型》，《中正漢學研究》20(212.12): 303-317。

之跡。而新式時間觀的建構，也使小說家能想像中國美好的未來，創造「大同時間」。

其三、關於鐘錶及鐘點時間的價值探討。從姬文《市聲》可理解時間與經濟、國族與外族在「全球化」歷程中的轉變。蔡元培與陳天華均已意識到現代鐘點時間、個人與國家之關係，針對鐘錶所提供的準確性、同一性，甚至限定性，進而規範小說人物的個人作息，期望達到光復中國之目的。吳趼人則希望能拿回或創造屬於中國的時間，隱含了一種力抗「時間」（尤其是歐美強國的）的統一性、全球化，尋回或再創屬於中國人的輝煌時間。

總之，本文透過階段性考察，發現在「中西海通」之後，特別受到工業化及歐風美雨之影響與刺激，新興鐘錶、鐘點時間的時間觀，不僅衝擊到中國傳統的時間體系，亦使晚清小說家程度不一的運用這些具備現代性、科學化、新的時間修辭，闡述各自的時代關懷與訴說故事，連帶影響晚清的小說藝術內容與表現，產生新的質變。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明·羅貫中，《精印三國演義》下冊，臺北：老古文化公司，2009。

清·王先謙編，《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下）》，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包天笑，〈世界末日記〉，收入于潤琦主編，《清末民初小說書系·科學卷》，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

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晚清小說大系》第 19 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吳趼人，《劫餘灰》，《晚清小說大系》第 27 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吳趼人，《情變》，《晚清小說大系》第 27 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吳趼人，《恨海》，《晚清小說大系》第 29 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吳趼人，《發財秘訣》，《晚清小說大系》第 37 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吳趼人，《新石頭記》，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33 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清·吳趼人，《糊塗世界》，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 33 冊，南昌：江西人

民出版社，1988。

清·吳趸人，《我佛山人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89。

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晚清小說大系》第13-14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李伯元，《文明小史》，《晚清小說大系》第36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5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影印本。

清·呂熊，《女仙外史》，鈞璜軒刊本。

清·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晚清小說大系》第1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紀昀，《繪圖閱微草堂筆記》，臺北：廣文書局，1991。

清·姬文，《市聲》，《晚清小說大系》第37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孫家振，《海上繁華夢》，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11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清·海上獨嘯子，《女媧石》，王繼權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第3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清·徐枕亞，《玉梨魂》，臺北：文化出版社，1992。

清·袁枚，《子不語》，蕭林主編，《中國禁毀小說110部》第4冊，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清·張春帆，《九尾龜》，《晚清小說大系》第22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陳天華，《獅子吼》，《晚清小說大系》第7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晚清小說大系》第31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清·庾嶺勞人，《蜃樓志》，臺北：雙迪國際出版社，1996。

清·陸士諤，《十尾龜》，蕭林主編，《中國禁毀小說110部》第49冊，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

清·曹雪芹、清·高鶚著，《紅樓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清·曾樸，《孽海花》，《晚清小說大系》第16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鄭燮山樵，《補紅樓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清·蒲松齡，《聊齋誌異》，長春：吉林出版社，1995。

清·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管同，《因寄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影印本。

清·劉鶚，《老殘遊記》，《晚清小說大系》第 28 冊，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清·劉鶚著，劉德隆整理，《劉鶚集》上冊，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清·韓邦慶，《海上花列傳》，臺北：三民書局，1998。

王雲五主編，《清會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年影印本。

王燕輯，《晚清小說期刊輯存》，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二、近人論著

（法）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著，林琴南譯 1930 《茶花女遺事》，上海：知新出版社。

王爾敏 1977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

王爾敏 1996 《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社。

王中江 2002 《進化主義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德威 2005 《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汎森 2017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英）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趙旭東、方文、王銘銘譯 1998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

（美）利昂·塞米利安（Leon Surmelian）著，宋協立譯 1987 《現代小說美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英）李約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著，陳立夫主譯 1977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九冊機械工程學（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英）李約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著，李彥譯 2009 《中國古代科學》，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

李歐梵 2001 《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歐梵 2012 〈晚清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課題〉，《清華中文學報》8(2012.12): 3-38。

呂理政 1990 《天、人、社會：試論中國傳統的宇宙認知模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吳國盛 2019 《時間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
- 阿英編 1937 《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 金國平、吳志良 2004 〈從自鳴鐘探討利瑪竇居留北京的內幕〉，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6輯，合肥：黃山書社，頁126-132。
- 周東怡 2018 〈清末《奏定高等小說堂章程》與《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的修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0(2018.12): 79-118。
- (英) 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 著，林紓、魏易譯 1981 《迦茵小傳》，北京：商務印書館。
- 胡衍南 2010 〈清代中期世情小說研究——以《蜃樓志》、《清風閣》、《雅觀樓》、《痴人福》、《玉蟾記》為主〉，《國文學報》47(2010.6): 263-290。
- 胡衍南 2012 〈論《紅樓夢》早期續書的承衍與改造〉，《國文學報》51(2012.6): 179-202。
- (德) 韋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 著、馬奇炎等譯 2012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徐莉莉 1991 《中國紀時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美) 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 著，鍾永強譯 2008 《中國與達爾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唐宏峰 2012 〈日常生活、視覺經驗與文學敘事：近代文學中的新式交通工具(1870s-1910s)〉，《東華人文學報》20(2012.1): 107-136。
- 康來新 1986 《晚清小說理論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
- 許暉林 2014 〈論《老殘遊記》中的身體隱喻〉，《成大中文學報》44(2014.3): 255-290。
- 張日郡 2016 「晚清以降《三國志演義》故事新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 張日郡 2021 〈「社會達爾文主義」風潮下的新小說創作——以陸士諤為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35.1(2021.6): 85-102。
- 陳平原 1996 〈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以「飛車」為中心的考察〉，《中國文化》13(1996.1): 114-131。
- 陳平原 1998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文新、王同舟 2012 〈《新石頭記》的文化藍圖與清末民初的文化轉型〉，《中正

漢學研究》20(2012.12): 303-317。

- 陳俊啟 2019 《依違於傳統現代、中西：晚清小說新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黃錦珠 1995 《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演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黃金麟 2006 《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
- 黃東陽 2008 〈歲月異遷，常恐奄謝——唐五代仙境傳說中時間母題之傳承與其命題〉，《新世紀宗教研究》6.4(2008.6): 37-66。
- 黃克武 2010 《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黃俊傑 2015 《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傅修延 2013 〈聽覺敘事初探〉，《江西社會科學》2013.2 (2013.2): 220-231。
- 湛曉白 2013 《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游勝輝 2018 〈人巧合天工，新物勝舊物——論清代〈自鳴鐘賦〉西方新物之書寫模式〉，《東華漢學》28(2018.12): 145-180。
- 楊念群 1998 〈論戊戌維新時代關於「習性」改造的構想及其意義〉，《浙江社會科學》5(1998.9): 105-110。
- 楊聯陞 2005 《國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
- 劉文英 2000 《中國古代時空觀念的產生和發展》，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 潘少瑜 2008 「清末民初翻譯言情小說研究：以林紓與周瘦鵑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
- 潘少瑜 2015 〈世紀末的憂鬱：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的翻譯旅程〉，《成大中文學報》49(2015.6): 79-82。
- 潘少瑜 2018 〈星際迷航：近現代文學中的宇宙視野與自我意識〉，《中國現代文學》34(2018.12): 193-232。
- （英）鄧得（Tim Dant）著，龔永慧譯 2009 《物質文化》，臺北：書林出版公司。
- 顏健富 2014 《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樂梅健 2006 〈論《海上花列傳》的現代性特質〉，《政大中文學報》5(2006.6): 89-104。

Timepiec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Time in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Chang Jih-chun^{*}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first uses three central aspects, object, time, and material, to establish a basic structure with which to examine the relevant descriptions of clocks found within ancient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Furthermore, a material writing perspective is employed to explore how late Qing dynasty novelists depict timepieces, portrayals which differ from their ancient counterparts, as well as formulating a new perception of time, all of which became a characteristic of narration that integrated character psychology. The author then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ock time and the artis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novels—including the refinement of their settings and the actions of their characters—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demonic imagination, and how the writings sculpt a “better future.” Finally, behind the reproduction of both timepieces and time, a discussion of value exists concerning the two subjects, one which breaks away from traditional thinking as well as reflecting the profound meanings of the individual, the nation, and the livelihoods and economy of the people.

Keywords: Qing dynasty novels, timepieces, clocks and watches, clock time, reproduction of time, evolution

* Chang Jih-chun, Independent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